

茶旅春秋

◎ 詹罗九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茶 旅 春 秋

詹罗九 著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旅春秋/詹罗九著.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109-13774-5

I. 茶… II. 詹… III. 茶-中国-文集 IV. TS9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230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穆样桐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36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王艾芝女士！

序一

【茶旅春秋】

蓦然回首，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及其在路上留下的脚印，感慨万千。

去年“五一”，到安徽石台，看望詹老师。和先生一块谈天说地，擦出不少智慧的火花；和先生一起游山看水，窥得茶业发展之一斑。先生高龄，虽行动不如以前便捷，让学生多有心酸；然思维敏捷，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八百里山河，且心态坦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不是“发挥余热”而是“主动加热”，服务社会而不求名利，又颇让学生坦然。

15年前，入得先生门下。随先生去江西婺源调研，看先生如何解析茶业发展命脉。从先生习得之茶业知识，目前仍依稀记得；习得之调研方法，至今仍在在使用；习得之人生应有态度，享用终身。到目前为止，仍在感叹人生之幸运，在学习成长的关键时刻，有幸得到几位老师悉心指点，保证了人生航道没有大的偏离，少了许多弯路。

梅贻琦校长曾有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校长是从办学的角度说，从做学生的角度而言，更是如此。若干年后回母校，那些熟悉的“大楼”恐怕都早已“烟消云散、灰飞烟灭”



了，而“大师”传授的人生态度、研究方法、专业知识等“长留心间、永不磨灭”。遇到“大师”越多，打下的烙印越深，人生越是顺当，为社会贡献也就越多。

30年前，改革开放大幕拉开，茶叶行业改革基本上同步推进。先生完整经历了行业改革全过程，是改革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该书汇集了先生在各时期的一些思考，串在一起，行业改革的全貌一览无余。

我在1992年进入茶业行当，后来又游离于行当之外，但与先生的交情不断线，对茶业行业的思考不断线。窃以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茶叶行业30年发展的一条主线。承包制改革，是生产领域的改革，改出了“千家万户”，改出了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废弃统派购制度的改革，是流通流域的改革，改出了星星点点的茶业交易市场。可是，千家万户要成功地与市场对接，还真是一个大问题，茶业产业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应运而生。那时候先生就指导我对产业化进行了一些思考，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收在此集。后来我的博士论文仍将此作为研究方向。实事求是说，先生和我对产业化的看法也是在逐步发展、逐步深入的，迄今为止恐怕也不见得能“大彻大悟”。

产业化提出这么多年，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到底毛病出在哪里，确实值得深思。只有找到并解决制约产业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茶业产业化才能稳步推进。

一家之见，制约产业化发展的根源还是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冲突。“公司+农户”是产业化的主要形式，公司代表的是资本，农户代表的是劳动。“公司+农户”这种形式的成功之处在于把资本要素引进到茶业行业，



依仗资本的力量去开拓市场、发展生产，带动行业的发展和繁荣。资本的特点就是流动迅速，普洱茶的泡沫得以迅速吹起又迅速消去，就是资本的力量。这些年，公司在与农户打交道过程中，冲突不断，合作不稳，本质上是在现有土地制度下，政府不允许企业把农户纳入到资本控制的体系；当然，在现有制度下，也没有办法把资本纳入农户控制的体系。公司和农户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要素的较劲。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产业化的另一种形式，在目前由于无法较好地在此框架下引入资本并发挥其作用，发展起来步履蹒跚。

先生退休后，在企业做顾问，与茶农打交道，游走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对它们的冲突看得很清楚，对如何消除冲突也设想了很多办法，在先生后期的文章中清晰可见。一些问题先生还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思考，这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很虚”。因为，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要素之冲突，其实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抬头望路，看看前面的山路和路上横亘的一个个台阶，更是感慨万千。

先生高龄，在人生台阶上爬了多年。至少有三点值得我等晚生后辈在今后行路中认真学习。第一，要积极入世。知识分子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要精忠报国，回报社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个人对社会贡献有大小，但不能危害社会。我现在对初次去先生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先生家中堂挂一幅字，上书“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先生在回顾过去走过的人生道路时，曾经和我说过，他最为心安理得的是，没有祸害社会。这里的社会，是抽象的，也是具



体的。最小的社会，就是身边的人。第二，要积极进取。先生到现在仍笔耕不辍，仍在学习新的知识，积极思考天下大事，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为农民致富殚精竭虑。包括出这本书，也是在对过去的想法进行梳理、总结，并试图进行提升。在总结思路历程之外，我曾经给先生建议过，要再写个自传，对人生经历做个总结。自传写好了，可以帮助后人从先生之经历观察社会之脉动、茶业行业发展之风云，这是为社会留下的另一笔财富。第三，要淡泊名利。前面说的积极进取，不是名利的进取。先生做人做事，从不求回报，即使对于子女，也是如此。先生因此而省去许多常人的烦恼，仙风道骨，寿眉飘飘。这也是先生教会我的最大财富，当终身铭记。

先生命弟子作序，备感荣幸，幸甚至哉。愿先生健康长寿，愿中国茶业万古长青。

曹利群

2009.3.4 于北京

（曹利群，湖南郴州人，1996年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机械制茶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安徽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序二

[茶旅春秋]

话就从“师生缘”说起吧！初“识”詹老师，是在四川农业大学四年级。从先生主编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茶业经营管理》，我第一次认识了一位没见过面的陌生学者。

由于自进入大学校门起，就觉得自己对技术学科既不擅长亦乏兴趣，一直处于彷徨、懵懂状态。直到1996年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不思进取的我还在睡懒觉，一位室友带回一张安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并提醒我，不想学技术学科，可以考安徽农大茶业经营管理吗！我遂决定考研。虽然当时招生简章上没有明确指导教师，但凭直觉应该是詹老师。于是我冒昧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了来信，先生给了我不少鼓励。

1997年有幸成为詹老师门内弟子。三年的研究生历程，在皖期间的方方面面，都得到詹老师的关爱和培育，真是三生有幸。

后来攻读博士也得到恩师的帮助。1999年，先生因公进京，顺路去了一趟天津南开大学。据他自己说，是因研究茶业史，通过在南开攻读制度经济学的门徒曹利群，拜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丁长清先生。后来我有幸在丁教授门下继续深造，不能说与这两位学者的这次学术交流没有关系。



2003年，先生拟撰写一本纪念茶叶价格体系和流通体制改革20周年的论著，特邀曹利群和我参加。三人一拍即合，一气呵成，35万字的《中国茶业经济的转型》一书，2004年终于按时出版发行。

与先生的忘年情谊和学术交流，至今已有十多年了，后生感慨万端。

《茶旅春秋》是继2007年出版《无梦茶山行》后，即将出版的又一本文选。是先生各个阶段代表性成果的汇编，也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茶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茶叶科学长期以来强调种、采、制，对销售管理关注不多，这可能也是19世纪后期，西方掀起茶叶消费革命使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光环旋即褪尽，而此后近百年间，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再无回天之术的重要原因。

1984年6月9日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后，中国茶业经济开始转型，并逐渐迸发出活力，而名优茶开发和整个茶产业的市场化成为活力之源，先生是茶业经济转型时期的弄潮儿。

名优茶开发方面，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但积极投身于实践，并持续不断的取得成果，安徽某些历史名茶的恢复，一些新名优茶的开发，先生功不可没，而且在名优茶开发理论上也有建树。1993年先生作为第一作者编著了《名优茶开发》，这应该是国内较早的名优茶开发著作，业界反响良好。当然，这些与先生茶叶科班出身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在制茶方面先生尚有专著《炒青绿茶——鲜叶》、《炒青绿茶——技术条件》等。

如果说名优茶开发是建立在先生长期制茶技术、茶叶审评、茶叶机械、茶园田间生产准确把握基础上的



话，那么对茶叶经营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则可能更具开拓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顾问专家给地方、企业出谋划策，就茶叶拍卖等较早作了大胆的尝试，直到今天仍然站在第一线。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贡献而言，先生在理论方面的贡献并不逊于实践。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教材《茶叶经营管理》，新近著作《中国茶业经济的转型》等，在理论界都有较大反响。

茶在中国不仅是一种商品，从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文化。先生在茶文化方面不仅著书立说（《中国茶文化大辞典》、《名泉名水泡名茶》等），还曾任安徽农业大学首任茶文化研究所所长，而且将传统茶文化创新，应用于实践。远的不说，仅2008年就参与组织策划实践了安徽天方茶业（集团）公司的徽茶进京公益活动和2008北京奥运青年营的茶文化活动。

先生自称是茶业方面的专家学者，而不是经济学家文化学者。但是，窃以为，他应用经济学文化学的知识，解读茶经济茶文化方面问题，却颇有建树，破解问题，更是入木三分。读者从它过去、现在和即将出版的《茶旅春秋》中，都可以得到有益的启迪。

给自己的恩师著作写序，本身是一件有悖常理的事。恭敬不如从命，只能尽心竭力，拙作言差语错，实属无可奈何。愿先生寿满天年。是为序。

杨在军

2009.3.6 于石家庄

（杨在军，四川名山人。1996年四川农业大学茶学专业，获农学学士学位，1999年安徽农业大学茶学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2004年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国茶产业

——代序

一、茶业市场化

(一) 中国茶业经济的转型

茶叶市场可以从不同的属性划分。以产品结构划分，有名优茶市场、大宗茶市场和边销茶市场；以茶类划分，有绿茶市场、红茶市场、乌龙茶市场和花茶市场等；以市场供应链划分，有产区茶叶市场和销区茶叶市场；以市场交易方式划分，有零售茶叶市场和批发茶叶市场；以市场区域划分，有北方（华北、东北、西北）茶叶市场、东南沿江沿海茶叶市场和边疆少数民族茶叶市场；以市场的国际性划分，有国内茶叶市场（内销茶市场和边销茶市场）和国际茶叶市场（外销茶市场）。以下撰述的是国内茶叶市场。

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以前，市场主体单一，流通环节过多，产销脱节的现象突出。茶农、茶场、茶厂、茶商都几乎没有市场风险，在茶货短缺的情况下，由政府维护“市场交易”和承担可能发生的风险。茶叶市场的地区和部门的条块分割十分明显。

茶叶流通体制改革以后，市场逐渐取代政府成为配置资源之“看不见的手”。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式市场逐渐形成，地区分割、条块分割逐渐打破，大型茶叶批发市场“买全国茶，卖全国茶”已成为现实，国内“自由交易”的多渠道的茶叶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使云、贵、川早春的名优茶通



过空运，可以在东部各大都市当天与消费者见面，抢先登市。全国各地茶叶市场的商品结构（茶类结构和品质等级结构）、营销方式（批发和零售市场、超市、专卖店、邮购、茶摊、行商茶贩等）也趋于多元化。

1984年后茶叶统购统销体制开始淡出，伴随着茶叶市场的发育，原来的茶叶生产、加工和流通主体逐渐衰败、退出或改制，新的市场主体开始产生、发育。具体地说，在茶园生产和茶叶初加工环节，承包制的推行，茶叶生产队退出历史舞台，专业或兼业的种茶户取而代之；国营茶场的经营逐步下放到家庭层次；在茶叶精制环节，原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开始倒闭，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和私营企业；在茶业流通环节，原隶属供销系统的经营性公司逐步退出，个体茶商不断崛起。茶业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茶业市场经济转型。

（二）茶业市场化的滥觞——名优茶市场

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经营大宗外销茶为主，其次是边销茶，内销茶多是外销茶加工过程剩余的“边角料”，市场上能见到的名优茶，数量少，档次低。数量极少的高档正宗名茶，多在“系统”内“消化”了，无需进入市场。习惯了上述商品结构经营业务的国营公司及其营销网点，缺乏名优茶市场营销资源和激励机制，也没有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面对1980年代中后期生产量逐年上升的名优茶，束手无策，错失商机。

计划经济时期残存下来的茶叶商贩，长期在城乡间游动，拾遗补阙，做小本的茶叶买卖，养家糊口。

“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他们最早捕捉到名优茶供求的信息，启动了少量的贩卖活动。开始是“提篮小卖，走街串巷”；后来是“聚集交易，隐现无常”；最后是“聚集而市，公开交易”。名优茶市场“水到渠成”、“应运而生”。由于当年名优茶经营利润十分丰厚，茶商茶贩，“潜滋暗长”。安徽农垦皖南茶区各茶场名优茶“坐地销售”不景气，“逼上梁山”，迫使一批茶工进城开店



卖茶，据说后来有几千人成了茶商。茶农中一些有商业智慧的能人，“背靠”茶山，进城开（茶）店，有许多也成了茶商甚至是大茶商。某些地方的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也从多方面扶持茶叶市场。

从“体制外”孕育而成的雏形的名优茶市场，与“体制内”的茶叶公司，是“井水不犯河水”，形成了转型时期的二元化茶叶市场格局。这种渐进式的市场化，减少了行业内不同经营主体间的摩擦，降低了改革成本。

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类国营茶叶企业先后“淡出”或实行市场化改制，名优茶市场向统一的茶叶市场过渡。安徽峨桥、浙江新昌、福建安溪、广西横县、北京马连道、济南张庄等一大批功能各异的茶叶大市场相继形成。到20世纪末，茶业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历时近20年，这期间没有因国企改革、市场竞争、经济环境巨变，而发生大起大落的波动。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家免征茶叶特产税后，茶业经济开始了新的增长。

中国茶叶产量从1978年的268 000吨（其中95%以上为大宗茶），增长到2007年的1 165 500吨，年均递增5.2%，且897 500吨的增量中，名优茶约占30%~40%。笔者保守估计，目前中国茶园生产能力为130万~140万吨，只是由于市场供大于求，许多有使用价值的茶鲜叶原料留养在茶树上。

中国茶叶出口从1978年的8.69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28.95万吨，年均递增4.2%。出口的商品茶以中低档大宗茶为主，名优商品数量甚微。中国茶叶内销从1978年11.51万吨左右，增长到2007年的87.60万吨左右，年均递增7.2%左右，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过去茶叶市场长期供给短缺的补偿，为超常规增长。内销市场供给的商品中，有相当数量的名优茶。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茶业经济已开始步入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市场主体的孕育

（一）承包制的推行和种茶农户与乡镇茶叶生产组织的兴起

农业完成合作化之后，全国茶园生产和茶叶初制环节，主要隶属两大系统，一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经营的茶园和茶场；二是农垦、农业、林业、侨务、司法、民政等部门兴建的国营茶场。据有关资料统计：1988年全国有国营茶场630多个，茶园面积近8万公顷，茶叶产量达52500吨，产值5亿多元，分别占全国茶园面积、产量、产值的7.4%、9.6%、18.0%左右。各类茶场的兴建，有效地保证了茶叶生产的恢复和快速增长。

但是，茶叶生产的高速度，并不等于茶叶生产的高效率、高效益。人民公社制度下茶叶生产的低效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营茶场的生产效率也大体相似。

低效率的成因：一是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不到位，导致生产者积极性难以发挥；二是决策权太集中，信息失真、滞后，决策失误过多；三是除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投入严重不足。国营茶场的情况除了产权结构问题外，其他也大致相同。

生产的低效率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各类经济组织解体（改制）的深层次原因。

承包制的推行——即人民公社的解体，是农民、地方政府、中央决策层三方互动的结果。人民公社解体，社队茶场崩坍，奠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经济组织的地位。1986年以“大包干”为主的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覆盖全国。

农户成了茶园生产和茶叶初制的基本经济组织。承包制向国营茶场渗透，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营茶场绝大部分茶园到户，初制茶厂转由私人承包，农户成为了国营茶场的基本经营单位。

（二）茶叶价格体系和流通体制改革与个体茶商的兴起

1. 茶叶统派购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选择了重

工业化的目标。实现重工业化，一需要资金，二需要外汇。资金哪里来？降低城镇各类人员工资，降低农产品价格，以保持廉价的生产要素供给。高估本币价格，扭曲汇率机制，也属于必然的货币政策取向。

1949年之后，国有商业部门在农村一直面临着和私商的竞争，降低农产品价格的物价政策，使国有商业部门处于竞争弱势，1953年秋后，许多地区国家粮食收购任务没有如期完成，粮食购销量失衡，必将影响到国家的重工业化进程。农产品的垄断经营势在必行。茶叶自明末清初以降，是中国商品率最高出口额最大的主要商品之一。20世纪30年代的国营中茶公司就有以茶叶出口创汇，换回军用武器支援抗日战争的史实。政府垄断茶叶经营和出口业务，可谓“一石双鸟”，既积累资金，又换回外汇。

1949年11月23日（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两个月），以吴觉农为总经理的新的国营中茶公司成立，它是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性质的公司。由此可见，国家当年对茶叶外贸的重视程度。吴总经理曾是旧的中茶公司要员，对垄断经营是“轻车熟路”，加上政府大力扶持，新中国茶叶生产恢复很快，立竿见影，积累资金和出口创汇双双很快见效。

继1953年油料和粮食实行计划购销、1954年棉花又实行计划购销，1955年8月，政府颁布《农村粮食统购暂行办法》，对统购统销做出了分类管理的详细规定。茶叶定为第二类“派购”商品，由中央实行差额调拨。嗣后的20年间茶叶派购率（派购量/生产量）一直稳定在90%~95%左右。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茶园面积开始加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承包制实行后，茶叶生产量逐年急剧上升，茶叶派购率逐年下降（表1），茶区消费有余的茶叶，通过体制外的各种渠道流向销区市场。开始数量不多，无关大局。但是，茶叶自由交易市场的“破窗效应”已见端倪。到20世纪80年代初，派购率已下降到80%左右，并且出现了“仓容危机”，



茶叶市场价格与国家收购价格、市场供给与需求，趋于均衡，“派购”已逐渐成了国家的“包袱”，垄断经营效果，开始走向“负面”。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

表 1 1975—1993 年中国茶叶生产量、收购量和收购率统计

单位：万吨、%

年 份	生产量	收购量	产购差额	收购率
1975	20.05	19.37	1.86	92.0
1976	23.53	21.47	1.88	91.9
1977	25.21	22.81	2.40	90.5
1978	26.80	23.77	3.03	88.7
1979	27.71	23.69	4.02	85.5
1980	30.38	25.12	5.26	82.7
1981	34.26	27.37	6.89	79.9
1982	39.72	32.79	6.93	82.6
1983	40.06	30.90	9.16	77.1
1984	41.42	30.25	11.17	73.0
1985	43.23	28.47	14.76	65.9
1986	46.05	30.25	15.80	65.7
1987	50.80	32.11	18.69	63.2
1988	54.54	34.69	19.85	63.6
1989	53.49	30.54	22.95	57.1
1990	54.05	29.29	24.72	54.2
1991	54.16	32.20	21.96	59.5
1992	55.98	29.97	26.01	53.5
1993	59.98	26.80	33.18	44.7

注：收购率=派购量/生产量

2. 茶叶价格体系和流通体制改革 1984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